

回忆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

■ 严家炎

惊闻金庸先生因病逝世的新闻，心中深感悲痛！二十多年来，与先生交往的情景似乎还亲切鲜活，历历在目。

1991年，我曾在旧金山一个华人文化中心讲过两次金庸小说，当时在座听讲的陆铿先生不久即在香港一家刊物上作了较详细的报道。但那时我尚未与金庸先生本人见过面。

我与金庸先生真正相识，是1992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三个月研究期间。那是在文化界十一二位朋友相聚的一次小型宴会上，由陆铿先生介绍，金庸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宴席结束时，金庸先生又约我几天后到他的山顶道一号家中小聚。这次“小聚”倒真是一次相当酣畅的欢聚。我们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金庸的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又从围棋胜负聊到顶尖国手陈祖德以及金庸向他学习棋艺；再从香港将要回归聊到金庸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总之，是我向金庸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

一直到厨师送来了下午的点心，我们的谈话才告一段落。餐后，金庸先生亮出旁边小桌上放着的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将它们送给了我。我当然非常高兴和感谢，随后向主人告辞。金庸先生又要他的司机驾车送我回中文大学的住处。

第二次与金庸先生见面，记得是在1994年10月的北京，那是北京大学经国务院批准，聘请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的仪式上。北大法律系教授同时也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萧蔚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学院院长冯其庸，都出席了这次隆重仪式。我在仪式上为金庸小说发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词，这篇贺词稍后发表在《明报月刊》上。金庸先生对此特意表示了感谢。

这之后，我们又分别在北大、大理、海宁、台北、科罗拉多等地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以及在华山论剑的活动中多次见面。还一起畅游了九寨沟、峨眉山、青城山，欣赏了壮观的钱塘潮。我每次去香港，大概也都会与金庸先生见面，地点或是在他家，或是在嘉华国际中心25层的办公室，或是直接在太古广场的复宴餐馆。在我记忆中，嘉华国际中心25层办公室曾去过多

次，连他陈列在那里的书籍也都相当熟悉。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金庸先生办公桌上有一付非常特别的木质斜面写字台板。我曾向他请教，这付写字台板有何用处？金庸先生相当得意地让我猜测。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写字台板装有可调节斜度的齿轮，能让写字者保持脊椎挺直，不致书写时弓腰驼背。我坐到椅子上用斜面台板试写了一下，果然身姿感到轻松、舒服多了。于是，金庸先生就提议要把这付写字台板送给我。我当然表示不能接受，因为金庸先生确实更需要。但金庸先生说，他已经七十多岁，使用率不高，而且他如果真还要用，让人再做一付也很容易。这样，我就变得没有理由不接受了，只能向他表示诚挚感谢并接受他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和情意。

与先生交往中，他的宽厚仁慈，聪明睿智，都给我和内子卢晓蓉留下了深刻印象。九十年代中期，卢晓蓉在北京大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该公司生产一种降血脂的药。这种药既传承了中华医药的特长，又添加了现代科技的要素，具有良好的疗效。先生知道后，一直很关心，我们每次见面，他

都很关切地问长问短，让我们和公司的员工都很受感动。而且他不仅自己试服，还多次用一句很形象生动的话向亲友推荐：“它可以将好的胆固醇升上去，将坏的胆固醇降下来”，使我们不禁联想到他笔下一个个扬善去恶的大侠。

金庸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过三年，正式获得该校的博士学位。他办《明报》，始终以“明辨是非”“公正善良”为自己的方针。他的小说虽然描写古代的题材，却渗透着现代的精神，因而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金庸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一向非常关心香港的前途，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他撰写的数百万字的社评，不仅预言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是他本人的真切写照。

金庸永远是我们尊敬的一位前辈和老师。我们深信，世世代代的读者都会喜爱他的作品。日前得知先生走的时候，神色特别安详，令我们感到宽慰。愿先生的英灵在天堂安息！

板桥论“烧书”

■ 牟钟鉴

人们一提到历史上烧书事，自然会想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板桥对“烧书”则有自己的新解，使人眼界大开。

他把“烧书”扩展为三类：一类是孔子烧书，一类是始皇烧书，一类是作者自烧其书。他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中说：“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也。诗三千篇，存三百一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无所复存，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后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蚕其性，烧经灭圣，欲刺天而触人心，故身死宗亡国灭，而遭经复出。始皇之烧正不如孔子之烧也。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间风云雨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昔欧阳永叔读书秘阁中，见数千万卷，皆霉乱不可收拾。又有书目数十卷亦烂去，但存数卷而已。视其人名皆不识，视其书名皆未见。夫欧公不为不博，而书之能藏秘阁者，亦必非无名之子。录目数卷中，竟无一书一识者，此其自焚自灭为何如！尚待他人举火乎？近世所存汉、魏、晋丛书，唐、宋丛书，《津逮秘书》《唐类函》《说郛》《文献通考》，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类，皆卷册浩繁，不能翻刻，数百年兵火之后，十亡七八矣。刘向《说苑》《新序》、《韩诗外传》，陆贾《新语》，扬雄《太玄》《法言》，王充《论衡》，蔡邕《独断》，皆汉儒之矫矫者也。虽有些零碎道理，譬之《六经》，犹苍蝇耳，岂得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终身受用不尽。”引以上大段板桥家书文，是为了全面了知板桥“烧书”之论，有其精彩之笔，亦不可商榷之处。板桥所说的“烧”是广义的湮灭，书被读者遗忘也是“烧”了。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始皇真在烧书外，说孔子烧书和一些作者自烧自家书，那不仅有道理，还非常深刻。唐代吴道子《先师孔子行教像》的题词是：“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孔子删述六经是儒者都赞同的，这种删述乃是整理、选择、集大成之谓，为此必须去粗取精，使《六经》流芳百世，这就是孔子建设性的“烧书”。历代总有若干书，即使收藏于秘阁，也没有多少人光顾，或霉烂，或尘埋，大概价值不大吧，这就是“自烧书”。不过有些大型工具书，如板桥提到的类书《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习称“三通”，乃是经典训诂的重要参考书，历来受到重视，在当代史学再兴的时候，用途就更大。《六经》与《左》《史》《庄》《骚》固然重要，也需要解读之作和诸子百家之并存，才能相得益彰。板桥平生不治经学，不谙考据，故认为“三通”一类典籍乃无用之书，当然是一种偏见，我要为类书及诸子说句公道话。

不过，我对板桥“自烧书”也有同情的理解。历代人士皆视前代

遗书为珍品，越古越珍重，于是反复整理，编为丛书，建立书库，编制目录，待人查阅，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传承工作。但是，其中必然有若干部书一直无人问津，只有文物价值，并无学术功用，这就是“自烧书”，使人无可奈何。我们已经有了《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大藏经》《道藏》《诸子集成》《百子全书》《皇清经解》《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经籍纂诂》《古今图书集成》《十三经注疏》等，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古文献资料的供给足矣，今人是否有必要化大财力人力再去做大型古籍新编之类的书籍呢？即使做出来也没有人去。不如在薄弱环节上多下功夫，如编出更好的目录便于查找，制成电子版在网上流传，加大地方史志的编辑，加强与古籍中提取精华并实现创造性转化等。当代作者群庞大无比，出版事业空前发达，可是有许多书出版不久便不流通，变成废纸，岂不也是在自烧书么！看来自烧书现象还会继续下去，也许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也走下去的。

我还要补充说，秦始皇破坏性烧书一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而且后来的烧书比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秦汉代謝之际，初灭项羽兵威，但迷信勇力而无文化，《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引兵四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可以想见，秦朝保留下的古籍也随之遭焚，而项羽眼里没有人道与文化，只有货宝妇女。板桥曾写《项羽》一诗：“已破章邯势莫当，八千子弟赴咸阳。新安何苦坑秦卒，坝上焉能杀汉王。玉帐深宵悲骏马，楚歌四面促红妆。乌江水冷风帆急，寂寞野花开战场。”他指责项羽滥杀降卒而无仁义，遂有乌江自刎的悲剧结果。项羽既然与始皇同样残暴，又怎能取贤而代之。再看从南北朝到唐末发生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魏书·释老志》载：北魏太武帝灭佛，“诸有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真够残忍的。《周书·武帝纪》载北周武帝灭佛，“初断佛、道二教，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他好在还没有杀人。《唐书·武宗纪》载，武宗会昌五年灭佛，共毁大中寺院4600所，小庙4万佛，除了始皇真在烧书外，说孔子烧书和一些作者自烧自家书，那不仅有道理，还非常深刻。唐代吴道子《先师孔子行教像》的题词是：“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孔子删述六经是儒者都赞同的，这种删述乃是整理、选择、集大成之谓，为此必须去粗取精，使《六经》流芳百世，这就是孔子建设性的“烧书”。历代总有若干书，即使收藏于秘阁，也没有多少人光顾，或霉烂，或尘埋，大概价值不大吧，这就是“自烧书”。不过有些大型工具书，如板桥提到的类书《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习称“三通”，乃是经典训诂的重要参考书，历来受到重视，在当代史学再兴的时候，用途就更大。《六经》与《左》《史》《庄》《骚》固然重要，也需要解读之作和诸子百家之并存，才能相得益彰。板桥平生不治经学，不谙考据，故认为“三通”一类典籍乃无用之书，当然是一种偏见，我要为类书及诸子说句公道话。

不过，我对板桥“自烧书”也有同情的理解。历代人士皆视前代

世界的眼睛和心脏

■ 陈占敏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在麻省剑桥镇对全美大学生荣誉协会发表他那《美国学者》的著名演讲，这个演讲对美国民族文化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被霍尔姆斯称为“我们思想上的独立宣言”。在这个演讲中，爱默生发表了他关于学者、关于思想的重要思考：“学者被派去代表知识，正常状态下，他是所谓‘思想着的人’。在糟糕的情况下，当他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时，他就偏向于一个单纯的思想者，或者更糟一些，变为别人的思想的鹦鹉学舌者。”

学者一旦沦为鹦鹉学舌者，他作为“思想者”的意义就完全丧失了。不幸的是，多少学者都是这样的“鹦鹉学舌者”啊！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懒得思考，只是拾别人的牙慧，成为思想的贩子，四处游走，贩卖贩西，筐子里没有一样他自己创造的新鲜货色。爱默生形象地指出这种“学者”的悲哀：“无论一个人的天赋有多高，只要他不创造，他就不会拥有上帝智慧的清纯泉涌——或许已经有了煤块与烟膏，但却点不着火焰。”

有天赋的人的创造性来自哪里？学者的思想创造何由产生？好多人大约会想到书籍，想到读书。诚然，书籍中包藏了一代代学者的创造——这当然指的是那些好书——但是，对书却不能失去应有的警惕。在好多情况下，“我们拥有的只是书呆子，而不是‘思想着的人’”。各种藏书家、校勘家和狂热的注释学者，他们爱书如命，他们是“思想着的人”吗？不，其中的好多人并不是思想者，他们拥有的不是思想创造的本钱，只是书橱。“书籍使用得当，它是最好的东西。将它滥用的时候，则变成最坏的东西”。这里需要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即严格地让书服从于

读者”。为我所用，书才成为活的资源，流动不息，像血液注于我们的脉管，产生新的造血功能，创造出新的能量能源。思想便由此产生，学者成为了真正的思想者，不再只是两条腿的书橱。

在爱默生看来，书籍之外，尚有能够启发创造的巨大能源，那不是别的，就是自然。“面对自然，他胸中便会涌起一股狂喜，尽管他有自己的悲哀”。“难能猜想，海边的岩石教给渔夫多少坚忍不拔的精神呢？谁又能说出，那蔚蓝色的天空向人传授了多少心境平和的诀窍呢？——瞧那碧清的天穹，大风不停地吹起成群的乌云，却没能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的折绉或痕迹。甚至从那些野兽的古怪行为中，我们又学到了多少有关勤奋、节俭和友善的知识？”

爱默生好像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了，他对自然倾注了这样的热情，给予了如此诗意的赞颂。且不必辨析“主义”如何，反正爱默生对自然的称颂把我们的思想荡开，让我们想到极其遥远的年代了。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书籍不能够大规模印刷传播的年代，甚至在文字还没有产生的时代，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来自于自然的晨兴夕落，野兽的竞逐繁衍，大海的潮汐往来吗？古代思想家，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几乎同时诞生于纪元之前的思想巨人，他们的思想来自哪里？他们有何师承？读的是什么书？“有两样东西总使我的心里充满了新的、有增无减的惊叹——头顶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比他们晚了两千多年的康德，也是这样地对自然满怀尊敬和赞叹，而内心的道德法则，不也是与头上的星空遥遥相应吗？闪烁的星斗，也正是思想的闪光，内心道德法则的辉煌。

不要说离开了书籍，回归自然，倾心于自然，会让思想变得简单和粗糙，其实恰好相反，“伟大的

天才都具有返朴归真的能力”。一个伟大的天才，把自己融入自然，能够与头上的星空对话，他的沉思冥想能够符合自然规律，他就不必读书了。“天才把花里胡哨、荒诞炫耀的东西留给了新手，他自己却直接指向单纯与真实；它显得亲切、真诚，是我在很多形体中已经见到的古老永恒的事实——我活着就是要了解它；它就是我了如指掌的那种简单明白的你和我（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注）——已经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天才是最质朴最亲切最真诚的，像思想、真理本身同样品质。千万不要以为天才才是高深、就是玄奥，就是深不可测，绝不是的。天才就像你我的一个邻居，一个朋友，出现在街头巷尾，亲切地交谈于路边田头。

柏拉图的思想包含在他唯一的一本书中，《对话录》。“在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只有柏拉图够得上奥马尔给予《古兰经》的奇崛赞誉：‘把图书馆统统烧掉；因为它们的价值就在这一本书里。’”这样的赞誉，会让人大为惊异吧。一本《对话录》果真抵得上一座图书馆吗？大约，对一个人，对一种思想，对一本书崇拜到顶礼膜拜的程度，便会产生这样极端化赞扬吧。对这种赞扬产生怀疑，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读懂柏拉图的书。爱默生断言：“世界上在任何时代读懂柏拉图的人都不会超过十余人。”按照爱默生的说法，柏拉图的名言包含了世界各文化：它们是各个学派的基石，是各种文学的来源。它是逻辑、算术、审美、对称、诗歌、语言、修辞、文体论、道德或者实用知识方面的一种韵律。世界上还没有谁一个人思考的范围这么广大。现在的思想家们仍然大书特书、争论不休的一些事物和问题，都来自柏拉图。

我们的幸福和悲哀都在这里。我们拥有无所不包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可以免除寻觅探索的

辛劳，俯首而来；可是我们的思考，俯首而来；可是我们的思考，言说连篇累牍的著作，却仍然未能越出先哲的思辨范围，只是在先人的思想大圈子里划小圈圈，我们的思想即便有一点光彩，也笼罩在先贤巨大的思想光辉里，我们不能不相形见绌，甚而化为空无，我们思想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可以自我安慰的，也许在此吧：“述而不作”；孔子不就是这样自称吗？哪怕他是自谦。爱默生又何尝不是“述而不作”呢？面对自然，面对宇宙的终极真理，我们都是“述而不作”吧。爱默生的朋友把萨默塞特君的博学之士比作一个小孩，问孔子，天上有多少星星？孔子答道，他不知道，也不在乎。不知道爱默生的朋友关于孔子的这个故事的来自哪里。我们，大约都是那个小孩吧。还是爱默生的那个朋友说得好：“云雀是去年孵出来的，风却是千万年前孵出来的。”宇宙茫茫，真理无涯，我们这只小小的云雀，又怎么能够飞到真理的边际呢？

对人类的先贤圣哲，我们应该深怀感激，有了他们筚路蓝缕的文明开创，才有了我们对茹毛饮血的告别。即便够不上圣贤，只是一般学者，只要他不是鹦鹉学舌者，而是思想者的人，他也有理由获得我们的尊崇，因为“他是这世界的眼睛。他是这世界的眼睛。他要保存和传播英勇的情操，高尚的传记，优美的诗章与历史的结论，以此抵抗那种不断向着野蛮倒退的粗俗的繁荣。”

正因如此，爱默生也理应获得这份尊崇。在美国建国百年之后，他用他智慧优雅的演讲，高洁纯洁的思想，抵抗那种“不断向着野蛮倒退的粗俗的繁荣”。又过了将近二百年，那种“不断向着野蛮倒退的粗俗的繁荣”遍及全球的时候，爱默生的声音似乎被淹没不闻了。那不是爱默生的默哀，而是我们的不幸。

《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6期目录

主编 韩松林 执行主编 丁帆

大家读大家

张枣著 亚思明译 鲁迅《野草》以及语言和生命困境的言说(上)
李建军 有助于善，方成其美——论托尔斯泰的艺术理念与文学批评(下)

文学史新视野(主持人 王彬彬)

赵勇 赵树理的幽灵
西渡 博大生命：骆一禾与1980年代诗歌
郑利萍 个人体验与共同焦虑：消费语境中成长题材小说之探析
新作快评(主持人 王尧)
王晴飞 驴鸣与人声——读刘亮程《捎话》
项静 野生动物与不在场的花朵——评韩少功《修改过程》

刘阳扬 个人与历史的双重叙述

——评叶兆言《刻骨铭心》
潘莉 中庸的企业家及时代危机——读储福金《念头》

青年批评家论坛·重评与前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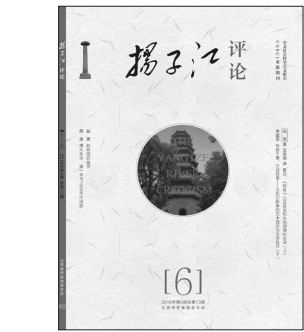
易彬 “命运”之书：食指诗歌论稿

兼及当代诗歌史写作的相关问题

张伟栋 “在无词地带喝血”——阅读读多多
郭瑾 新批评理论视野中的海子诗歌评析

作家作品论

刘琼 试论陈彦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和文化意识
——以《主角》和《装台》为例



张怡微 反讽 童话 齐聚

——重读《长恨歌》

宋剑华 青春记忆与历史真实的冲突

——关于《芳华》

罗慧林 诗歌与影像

——以代薇《深夜，听见一列火车经过……》为例
彭秀银 毕飞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黄河文学》2018年第10期目录

一频道

鸟境 /沙爽
山中一直很美 /傅菲
读书记 /白草
读读抄抄(之七) /白草
记住乡愁 /王琴
涿滩古镇：同心合力 众志成城 /陈松(编导)

五里街镇：义行传家

/王晓宇(编导)

小说

捕火的人 /陶林
慈悲(二题) /乔洪涛
猎熊记 /十八好
过大桥 /张好好
一尘不染 /郭妮妮
我所认识的小郭子(印象记) /罗望子
盗扇 /杨道

散文

当我有了你 /碎碎
笔记二则 /刘浪
那一抹倔强的眼神 /寒郁
种出来的扫把 /刘慧敏
1990，涪江向东 /王琴
听得见的声音 /梁炳青
合谷 /于亚群

黄河诗岸

我的北国(组诗) /北野

万物柔情(组诗) /方健荣

瓜尔佳·关燕山 /瓜尔佳·关燕山

礼物(组诗) /火禾

观点 散文的真诚与虚假

散文中的“类散文” /王彬

散文与虚构 /王升山

散文创作中的虚假问题 /司敬雷



虚构是对散文初衷的背离 /安黎

略说散文 /赵晏彪

按《人物素描》索驷 /李林栋

虚构庸俗的散文可以休矣 /朱小平

散文创作的底线：叙述者必须真实 /陈亚丽

真实是散文的生命线 /陈纸

散文的媚俗之病 /朱航满

主编 郭文斌 公众号主编 郭红 欢迎订阅2019年《黄河文学》邮发代号：74—27；订 阅：全国各地邮政局(所)，也可编辑部邮购。定价：每本10元，全年120元。电 话：0951—6888593 6888599 地址：750011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98号银川文化艺术中心东三楼